

中共党史上被秘密处决的几大叛徒 | 父亲李克农与潘汉年、王实味事件
吴德回忆林彪事件 | “周恩来遗言”案始末 | 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台前幕后

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精装本

历史真相

历史真相揭秘 政治人物兴衰 焦点事件深析

《作家文摘》/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014022815

K260.6
23

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精装本

历史真相

《作家文摘》/编



北航

C1710678

K260.6
23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真相 / 《作家文摘》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3.12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ISBN 978-7-5143-1228-7

I. ①历… II. ①作… III. ①政治事件—史料—中国—现代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2691号

因时间仓促、发表时间久远等原因, 本书仍有部分作品的作者未能取得联系。

请作者及时与编者联系, 支取为您预留的稿酬。

《作家文摘》编辑部 电话: 010-65001508

历史真相 /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出品人 臧永清

策划 张亚丽

编者 《作家文摘》

责任编辑 刘春荣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保定华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228-7

定 价 45.00元 (精装)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事 件

- 周恩来冷静处理“向忠发事件”……002
- 中共党史上被秘密处决的几大叛徒……007
- 许世友等“拖枪逃跑案”审判始末……012
- 抗战史上国共联手的一次刺杀行动……015
- 中共高级将领搭美军“便机”空降战略区……020
- 上将军衔授予前的“特嫌”风波……023
- 父亲李克农与潘汉年、王实味事件……027
- 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032
- 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罢官……037
- 秘密武装押解罗瑞卿总长追记……043
- 林彪坠机前后的空军指挥所……047
- 吴德回忆林彪事件……052
- 北京上空，导弹击落敌机……058
- 康生与“王实味案”……063
- 向毛主席状告江青的“朱、穆、李事件”……067
- 谋杀刘少奇的“湘江案”被粉碎实录……072
- 震动中央高层的“秘密录音事件”……077
- 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082
- 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088
- 熊向晖“牵线”叶剑英、华国锋……093

谜案

- 周恩来留下的千古之谜……100
- “周总理遗言”案始末……103
- 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被错杀案追踪……107
- 彭德怀“八万言书”密藏始末……114
- 谢觉哉纵论古今谈“潘汉年案”……121
- 揭开“王明中毒事件”之谜……125

真相

- 汪精卫叛逃的前前后后……130
- 皖南事变：傅秋涛部成功突围之谜……138
- 蒋介石处死韩复榘内幕……142
- 周佛海改判内情……147
- 东北局“五虎将”冤案始末……152
- 所谓整理江青“黑材料”的始末……157
- 为什么要开七千人大会？……167
- 白崇禧暴毙之谜……172
- 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台前幕后……176
- 中共九大选举内幕……181
- 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186
- 谭甫仁将军被害真相……190
- 毛远新母亲披露“托孤”真相……202
- 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204
-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208

“晋中事变”事件

· 事件 ·

晋中事变发生于1949年10月，是晋中地区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事变发生后，晋中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变的主要原因是晋中地区国民党当局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事变的发生。事变发生后，晋中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晋中地区国民党当局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事变的发生。事变发生后，晋中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晋中地区国民党当局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事变的发生。

晋中事变起因

晋中事变起因于晋中地区国民党当局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事变发生后，晋中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晋中地区国民党当局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事变的发生。事变发生后，晋中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晋中地区国民党当局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事变的发生。事变发生后，晋中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晋中地区国民党当局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事变的发生。

周恩来冷静处理“向忠发事件”

· 王仲典 ·

向忠发是中共中央第三任负责人，这位仅有初小文化却在武汉工运中一举成名的“工人领袖”，1928年代表中共赴苏出席国际工运会议时，被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看中，在7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当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向忠发于1931年6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成为中共历史上职位最高的叛徒。“向忠发事件”当时震动党内外。周恩来当时坐镇中央，直接处理“向忠发事件”。

向忠发贪色被捕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将工作重点逐渐往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转移，城市工作放到次要位置。加之，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人员遭到两次重大变故。这就是何孟雄等人被捕牺牲与罗章龙等人的另立中央，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整个城市工作遭到重创。至此，向忠发更觉情绪低落，几乎很少参与党中央的实际工作。

政治上的消沉必然带来生活上的沉沦与堕落。向忠发在上海，党中央为安全计，让其以“古董商人”为掩护，以掩盖其真实身份。没料向忠发却以此为由，

经常以富商身份出入租界一些繁华场所。身上钱不够，就借机利用职权，贪污党的活动经费，尤其是有了顾顺章这样的部下做帮手以后。

顾顺章，上海人，和向忠发一样，也是工人出身后来被物色进入了政治局的“工人领袖”之一。不过，顾顺章还握有中央特科负责人的相当实权。曾经在特科工作过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当时的特科有3个领导：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周恩来是决策人，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向忠发挂名不管事。”顾顺章在被捕叛变之前，已经利用其特殊身份，在上海滩吃喝嫖赌和抽大烟，无所不为。向忠发作为顾顺章名义上的顶头上司，两人接触颇多，在一些事情上深受其影响。

向忠发早年在武汉时，曾娶湖南湘潭农村女子刘秀英为妻，并生有一子。1928年向忠发从苏联返国居于上海后，一度将妻儿接到上海共同生活。然而，仅一年多，喜新厌旧的向忠发即与妻儿分居。不久，即让顾顺章为自己物色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年轻女子，姘居于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一幢三层洋楼里。

1931年4月25日，受中央委派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且立即叛变。敌特机关获得这些核心机密，如获至宝，当即在上海组织大搜捕。幸亏打入敌特机关的钱壮飞提前截获这一情报，并抢在敌人动手之前报告了党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将中央所有机关重要人员全部转移，才避免了由此造成的严重恶果和损失。

为了安全，向忠发与杨秀贞先是转移到中央租用的另一栋楼房居住。后来，周恩来怕向忠发不守纪律，随便外出活动，就让其单独住进自己家里，而将杨秀贞与任弼时的妻子陈宗英另行秘密安置在一处外国人开设的名为“德华”的旅馆里。

过了两个月，鉴于上海处境险恶，向忠发待在上海无事可干，目标又大，党中央决定将向忠发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但向忠发贪恋上海生活的繁华，以及惧怕苏区环境艰苦，迟迟不愿动身。再三催促下，向忠发不得不勉强答应离沪赴苏区，但又提出，他一定要和杨秀贞见上一面，并强硬地说：“不见不走。”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同意了他这一要求，但明确对其交代：第一，会面的

时间不宜过长，最好上午去，下午回来；第二，一定不许在杨秀贞处过夜。向忠发当面点头称是，但一转身就将党的纪律与规定视作耳边风。

1931年6月21日，向忠发在“德华”旅馆与杨秀贞一见，吃过午饭，仍不肯离开。当时，陈宗英再三催促，但向忠发就是不走。当晚，向忠发硬是将党组织不准过夜的嘱咐丢在脑后，赖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向忠发才离去，又贪图享受要租车回去，便到静安寺附近一家名叫“泰勒”的汽车行叫出租车。

谁知这家汽车行原来本是党组织的一个关系。其会计叫叶荣生，曾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识他。向忠发被通缉后，此人为贪得国民党当局的重金悬赏，与其姐夫范梦菊等人一起向特务机关告密。由此，向忠发当天在汽车行没等来出租车，等来的却是蜂拥而至的密探巡捕，当即被捕。因案情重大，6月22日当天即转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周恩来亲自主持营救

向忠发被捕的消息震动了中共中央。毕竟，向忠发仍然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主席的职务，是中共最高负责人。

“顾顺章事件”发生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对中央特科进行彻底改组。曾和顾顺章在特科工作过的主要负责人——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特内部的钱壮飞等同志，奉命立即撤离上海，转移到其他城市或根据地去。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成员，并迅速重组了中央特科的领导机构。指定曾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中央组织部长的赵容（即康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为特科的第一、二、三把手。特科总部仍设四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财政、交通以及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由陈云兼任；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察、反间谍等，科长由潘汉年兼任；三科是行动科，又称“红队”，负责镇压叛徒及锄奸，科长由康生兼任；四科为通讯科，负责电讯联络，科长为李强。

中央特科重组后，为防中央机关因类似顾顺章这类叛徒而遭破坏，内部采

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这也是几个月后向忠发叛变未能对中央机关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中央特科及高层获知向忠发被捕消息后，周恩来当机立断，亲手清理了所有重要文件，并立即安排党中央各机关紧急转移，以防意外。同时，通知了李富春、蔡畅同志，以及留在上海的瞿秋白等领导转移住址，然后他本人偕同邓颖超等转移到一个法国人开的饭店里面。处理好这些事，周恩来又亲自过问和主持开展对向忠发的营救活动。

具体营救任务由中央特科全力负责，最主要的担子落在了二科情报科潘汉年身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交代给潘汉年的首要任务是，具体了解向忠发被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切情报。尤其是要打听向忠发何时被押送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行车的路线，押送武装力量如何等。原来，周恩来与特科负责人当时拟订的紧急营救方案中，包括不惜“武装拦截囚车”这样一个大胆计划。

然而，正当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中央特科营救行动在紧锣密鼓进行之时，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6月24日上午，有秘密情报传来，向忠发已于当天凌晨被秘密处决于龙华监狱。而且，据内线可靠消息，处决前，向忠发已叛变投敌，供出了党中央大量机密！

几经周折终获原始口供

消息传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深感震惊，又十分不解。向忠发为何被处决得如此迅速？况且，其既已投敌叛变，为何仍遭处决？

周恩来处事一向缜密细心，思虑周全。叛变与否，关系着一个人的革命气节和政治生命，何况是向忠发这样的中央高层领导。他当即召来潘汉年，要求特科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搞到向忠发的原始口供。

潘汉年几经周折，终于搞到了向忠发的口供笔录副本。周恩来当即花工夫认真研读。经反复研究后，最后确定其真。原来，这份口供涉及一些党的核心机密。如今暴露在口供中，说明向忠发确已叛变无疑。

然而，令周恩来等领导感到疑惑的是，向忠发既已叛变，蒋介石为什么仍下令立即将其处决？

原来，向忠发被转往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当即密电请示蒋介石如何处置（其时向忠发尚未叛变）。据说，连蒋介石也没估计到身居中共最高领袖位置达3年之久的向忠发会叛变投降，因此当即复电熊式辉就地处决。在向忠发叛变后，警备司令部令军法处已录出向忠发的供词，但熊式辉却没有及时再报，而是按蒋介石的密令执行了枪决。

（《作家文摘》2009年总第1212期，摘自《文史春秋》2009年第1期）

中共党史上被秘密处决的几大叛徒

·王 勇 傅伟韬·

出卖罗亦农的何家兴夫妇

1928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束后，何家兴夫妇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何家兴夫妇感受到了与莫斯科截然不同的气氛，这两个小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冲动与梦幻很快被眼前的现实彻底击碎。他们频繁地出入酒馆、舞厅寻欢作乐，以填补空虚的灵魂。花天酒地的生活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但是党的经费非常紧张，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每月生活费才20元，只能满足在上海的最低生活标准。怎样才能弄到更多的钱？除了靠出卖灵魂、叛变革命，他们也没有任何别的本事了。

4月初的一个深夜，何家兴夫妇找到了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的一个帮办。何家兴对他说，自己知道中共中央一批机关和负责同志的秘密地址，如果对方能给他们两万美元，并且为他俩办好出国护照，那么他们就会把所知道的和盘托出。

空口无凭，那个帮办让他们拿出事实来证明。于是，两个叛徒回到秘密机

关，焦急地等待机会，几天之后，他们终于等到了时机。刚刚回到上海的罗亦农通知何家兴，4月15日上午10点，他要与刚来上海的山东省委书记碰面，让何家兴事先做好安全防范准备。何家兴迫不及待地到巡捕房告了密。

4月15日，当罗亦农与山东省委书记会面时，被英租界的巡捕逮捕。待巡捕们走后，何家兴赶忙报告党中央：罗亦农同志被捕了，可能是出了叛徒。

党中央立即做出三个决定：马上组织力量营救罗亦农同志，安排何家兴夫妇转移，迅速查找叛徒。

由于特科得到消息已经晚了，致使营救罗亦农的计划落空。4月21日，反动当局未经任何审讯，便将罗亦农杀害。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陈赓从巡捕房的“内线”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情报，同时拿到确凿证据，证实叛徒正是贼喊捉贼的何家兴夫妇。中央指示特科立即处决这两个十恶不赦的叛徒。

按照中央的指示，陈赓亲自制订了行动计划，两个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混入党内的叛徒戴冰石

戴冰石是上海人，曾经在上海总工会机关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上级指示隐蔽了很长时间。反革命屠杀已经吓破了他的胆，他可不希望共产党再找到他。但是国民党找到了他，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准备让一些过去在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工作的人伪装积极进步，打入共产党地下机关，更多地掌握共产党情况。在金钱和封官的诱惑下，戴冰石终于决心当走狗了。很快，伪装积极的戴冰石被吸收到党的地下工作机关，不久，又被吸收入党。

戴冰石的工作是在英租界平凉路一个专门经营纸张文具的铺面当伙计，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戴冰石负责收发文件，他的小姨子也在这儿帮忙。平时，这个机关主要是传递消息，有几位交通员经常来往于这里。在国民党特务组织那边，戴冰石与上司保持单线联系，所以即使是当时在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中居于显赫地位的我党内线杨登瀛，也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戴冰石导演的一出“苦肉计”使得他终于露了馅儿。原来，在杨登

瀛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特务组织驻上海的特派员之前，戴冰石已经通过上海特务组织与南京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实权人物杨剑虹取得了联系。戴冰石急于干出个样子来邀功请赏，便直接向杨剑虹提交了他破获其所在的平凉路秘密机关的计划，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下级机关交通员按常规来取文件的时候一举捕获多人，如果能在这些人中打开缺口的话，就可以破获更多的秘密交通站；二是如果这个机关被破坏，戴冰石就有可能被安排到中共中央的其他重要的机关去工作。戴冰石提出，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想出了一个“苦肉计”，提议敌人在抓捕时将他的小姨子也带走。杨剑虹非常赏识戴的这个计划，并保证会及时释放他的小姨子。

这些情况，杨剑虹并没有告诉杨登瀛，只是曾经对他说过：过些日子我交给你一个人，这人已经打进共产党的内部并取得了信任，一旦时机成熟，他会提供重要情报的。8月的一天，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杨登瀛将密封公函送往英巡捕房的政治部。在那里担任要职的华籍帮办谭绍良拆开一看，立即约杨登瀛一起带了十几个中外巡捕，来到戴冰石所在的文具店，搜走了没来得及带走的大批中共中央文件，同时当场逮捕了7个人，戴冰石的小姨子也在其中。3天后，这被捕的7个人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交由中方审理，正好由杨登瀛具体负责。两天过后，戴冰石的小姨子仍未被放出，他心中焦急，老婆又哭闹不止，逼得他狗急跳墙，直接找到杨登瀛，请杨登瀛将他的小姨子释放。这时，杨登瀛才知道戴冰石的真实身份。当天晚上，杨登瀛就与陈赓联系，汇报了所有细节和过程。经查实后，中央证明戴冰石的确是内奸，便命令在短期内除掉这个内奸。

9月初的一个早晨，戴冰石的老婆买菜回家，突然在菜篮子里面发现一张字条。戴冰石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德水，家乡来人，请于即日午后3点到湖北路东安旅馆3号房找张先生面谈。表兄。”

德水就是戴冰石的化名，“表兄”则是平时与戴冰石单线联系的中央机关联络员，“张先生”是指上级领导。戴冰石如约前往东安旅馆，被特工队员干净利落落地干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投入到国民党怀抱里的黄第洪

黄第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与周恩来非常熟悉。毕业后，他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1930年4月，组织上指示他先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然后去苏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谁也没想到，他又偷偷地回到上海，在闸北区的一个小客栈暂时住了下来。他给周恩来写了信，说自己回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追捕很紧，不得已又回到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给他在中央机关里安排个工作。周恩来于是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进行面谈。

其实，黄第洪的革命意志早已丧失，他只不过是妄想靠出卖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来向国民党反动派献礼。一接到周恩来的信，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信，以学生的身份告诉“蒋校长”，他在共产党里很不得志，有重要机密要直接同“蒋校长”面谈。

把“铲共”视为自己首要任务的蒋介石，当然重视黄第洪所说的重要机密。他将信转给了陈立夫，陈立夫自然不敢怠慢，立即转批让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处理黄第洪自首案。徐恩曾又把具体工作交给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杨登瀛与黄第洪确立了接头的地点、时间与暗号，见面时，杨登瀛告诉黄第洪：我以南京特派员的身份向你保证，你的安全不会有问题，只是，你怎样向我们证明你的自首是真的呢？

急于表明自己“诚意”的黄第洪向杨登瀛交代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供出了已经约好的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主动提出下一次会面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拿来。

杨登瀛与黄第洪分手后，感到事态严重，不能迟疑，迅速报告给了中央特科。

7月26日，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谈话的当天，一大早，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11点，城隍庙西街口，务将家伯亲笔信带来。堂兄。”黄第洪见到指令后，没有任何怀疑，觉得自己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要到了，按照约定时间准时来到城隍庙。

黄第洪刚刚在城隍庙西街口道边的树荫下站定，就见由东向西，一队轻骑飞驰过来。还没等他看清骑自行车人的面孔，就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冰冷的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中央特科的卓绝行动，把敌人震惊得简直无法相信事实。徐恩曾亲自到上海来检查工作，对杨登瀛忧心忡忡地说：“真奇怪，怎么共产党的消息这么快呢？”杨登瀛也沉重地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小心又小心，还是让共产党抢先了一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作家文摘》2006年总第912期，摘自《各界》2005年第12期）

许世友等“拖枪逃跑案”审判始末

· 胡永恒 ·

近日翻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意外地发现一份判决书，是1937年在延安审判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所作。判决并不长，一共千余字。其中的“事实”部分如下：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认为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结果组织了卅余人，约定在4月4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茅）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两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乘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阴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经中央司法部国家检察长侦查起诉。